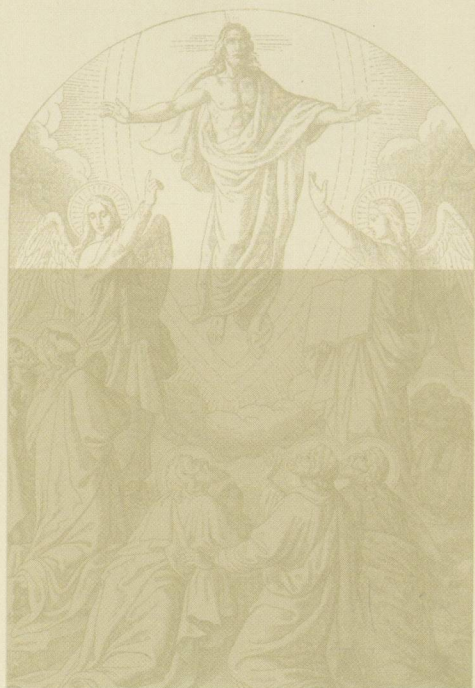


基督教经典译丛



何光沪 主编

On the Incarn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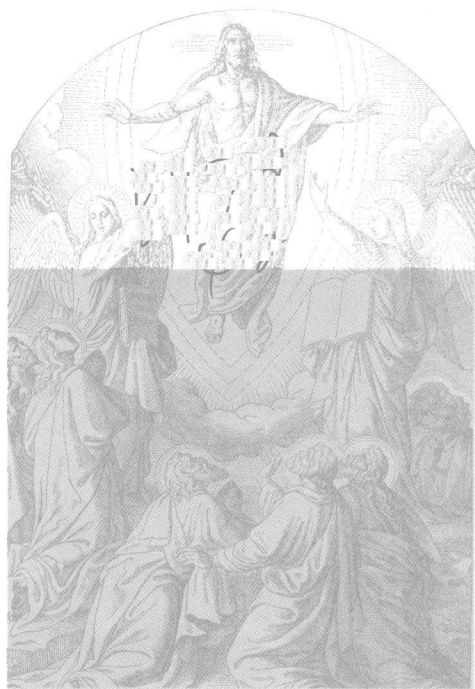
论道成肉身

[古罗马] 阿塔那修 著

石敏敏 译



基督教经典译丛



何光沪 主编

副主编 章雪富 孙毅 游冠辉

On the Incarnation

论道成肉身

〔古罗马〕阿塔那修 著

石敏敏 译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09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论道成肉身 / (古罗马) 阿塔那修著; 石敏敏译. —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9. 5
(基督教经典译丛)
ISBN 978-7-108-03134-1

I. 论… II. ①阿…②石… III. 基督教—教义—研究
IV. B9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32501 号

丛书策划 橡树文字工作室

责任编辑 张艳华

封面设计 罗 洪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9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35 毫米 × 965 毫米 1 / 16 印张 24

字 数 289 千字

印 数 0,001 — 8,000 册

定 价 39.80 元

基督教经典译丛

总序

何光沪

在当今的全球时代，“文明的冲突”会造成文明的毁灭，因为由之引起的无限战争，意味着人类、动物、植物和整个地球的浩劫。而“文明的交流”则带来文明的更新，因为由之导向的文明和谐，意味着各文明自身的新陈代谢、各文明之间的取长补短、全世界文明的和平共处以及全人类文化的繁荣新生。

“文明的交流”最为重要的手段之一，乃是对不同文明或文化的经典之翻译。就中西两大文明而言，从17世纪初以利玛窦（Matteo Ricci）为首的传教士开始把儒家经典译为西文，到19世纪末宗教学创始人、英籍德裔学术大师缪勒（F. M. Müller）编辑出版五十卷《东方圣书集》，包括儒教、道教和佛教等宗教经典在内的中华文明成果，被大量翻译介绍到了西方各国；从徐光启到严复等中国学者、从林乐知（Y. J. Allen）到傅兰雅（John Fryer）等西方学者开始把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著作译为中文，直到20世纪末叶，商务印书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和其他有历史眼光的中国出版社组织翻译西方的哲学、历史、文学和其他学科著作，西方的科学技术和人文社科书籍也被大量翻译介绍到了中国。这些翻译出版活动，不但促进了中学西传和西学东渐的双向“文明交流”，而且催化了中华文明的新陈代谢，以及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

清末以来，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学习、“取长补短”的历程，经历

了两大阶段。第一阶段的主导思想是“师夷长技以制夷”，表现为洋务运动之向往“船坚炮利”，追求“富国强兵”，最多只求学习西方的工业技术和物质文明，结果是以优势的海军败于日本，以军事的失败表现出制度的失败。第二阶段的主导思想是“民主加科学”，表现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尊崇“德赛二先生”，中国社会在几乎一个世纪中不断从革命走向革命之后，到现在仍然需要进行民主政治的建设和科学精神的培养。大体说来，这两大阶段显示出国人对西方文明的认识由十分肤浅到较为深入，有了第一次深化，从物质层面深入到制度层面。

正如观察一支球队，不能光看其体力、技术，还要研究其组织、战略，更要探究其精神、品格。同样地，观察西方文明，不能光看其工业、技术，还要研究其社会、政治，更要探究其精神、灵性。因为任何文明都包含物质、制度和精神三个不可分割的层面，舍其一则不能得其究竟。正由于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到了20世纪末叶，中国终于有了一些有历史眼光的学者、译者和出版者，开始翻译出版西方文明精神层面的核心——基督教方面的著作，从而开启了对西方文明的认识由较为深入到更加深入的第二次深化，从制度层面深入到精神层面。

与此相关，第一阶段的翻译是以自然科学和技术书籍为主，第二阶段的翻译是以社会科学和人文书籍为主，而第三阶段的翻译，虽然开始不久，但已深入到西方文明的核心，有了一些基督教方面的著作。

实际上，基督教对世界历史和人类社会的影响，绝不止于西方文明。无数历史学家、文化学家、社会学家、艺术史家、科学史家、伦理学家、政治学家和哲学家已经证明，基督教两千年来，从东方走向西方再走向南方，已经极大地影响，甚至改变了人类社会从上古时代沿袭下来的对生命的价值、两性和妇女、博爱和慈善、保健和教育、劳动和

经济、科学和学术、自由和正义、法律和政治、文学和艺术等等几乎所有生活领域的观念，从而塑造了今日世界的面貌。这个诞生于亚洲或“东方”，传入了欧洲或“西方”，再传入亚、非、拉美或“南方”的世界第一大宗教，现在因为信众大部分在发展中国家，被称为“南方宗教”。但是，它本来就不属于任何一“方”——由于今日世界上已经没有一个国家没有其存在，所以它已经不仅仅在宗教意义上，而且是在现实意义上展现了它“普世宗教”的本质。

因此，对基督教经典的翻译，其意义早已不止于“西学”研究或对西方文明研究的需要，而早已在于对世界历史和人类文明了解的需要了。

这里所谓“基督教经典”，同结集为“大藏经”的佛教经典和结集为“道藏”的道教经典相类似，是指基督教历代的重要著作或大师名作，而不是指基督徒视为唯一神圣的上帝启示“圣经”。但是，由于基督教历代的重要著作或大师名作汗牛充栋、浩如烟海，绝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像佛藏道藏那样结集为一套“大丛书”，所以，在此所谓“经典译丛”，最多只能奢望成为比佛藏道藏的部头小很多很多的一套丛书。

然而，说它的重要性不会“小很多很多”，却并非奢望。远的不说，只看看我们的近邻，被称为“翻译大国”的日本和韩国——这两个曾经拜中国文化为师的国家，由于体现为“即时而大量翻译西方著作”的谦虚好学精神，一先一后地在文化上加强新陈代谢、大力吐故纳新，从而迈进了亚洲甚至世界上最先进国家的行列。众所周知，日本在“脱亚入欧”的口号下，韩国在其人口中基督徒比例迅猛增长的情况下，反而比我国更多更好地保存了东方传统或儒家文化的精粹，而且不是仅仅保存在书本里，而是保存在生活中。这一事实，加上海内外华人基督徒保留优秀传统道德的大量事实，都表明基督教与儒家的优秀传统可

以相辅相成，这实在值得我们深长思之！

基督教在唐朝贞观九年（公元635年）传入中国，唐太宗派宰相房玄龄率宫廷卫队到京城西郊欢迎传教士阿罗本主教，接到皇帝的书房让其翻译圣经，又接到皇宫内室听其传讲教义，“深知正真，特令传授”。三年之后（公元638年），太宗又发布诏书说：“详其教旨，玄妙无为；观其元宗，生成立要。……济物利人，宜行天下。”换言之，唐太宗经过研究，肯定基督教对社会具有有益的作用，对人生具有积极的意义，遂下令让其在全国传播（他甚至命令有关部门在京城建造教堂，设立神职，颁赐肖像给教堂以示支持）。这无疑显示出这位大政治家超常的见识、智慧和胸襟。一千多年之后，在这个问题上，一位对中国文化和社会贡献极大的翻译家严复，也显示了同样的见识、智慧和胸襟。他在主张发展科学教育、清除“宗教流毒”的同时，指出宗教随社会进步程度而有高低之别，认为基督教对中国民众教化大有好处：“教者，随群演之浅深为高下，而常有以扶民性之偏。今假景教大行于此土，其能取吾人之缺点而补苴之，殆无疑义。且吾国小民之众，往往自有生以来，未受一言之德育。一旦有人焉，临以帝天之神，时为耳提而面命，使知人理之要，存于相爱而不欺，此于教化，岂曰小补！”（孟德斯鸠《法意》第十九章十八节译者按语。）另外两位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即胡适之和陈独秀，都不是基督徒，而且也批判宗教，但他们又都同时认为，耶稣的人格精神和道德改革对中国社会有益，宜于在中国推广（胡适：《基督教与中国》，陈独秀：《致〈新青年〉读者》）。

当然，我们编辑出版这套译丛，首先是想对我国的“西学”研究、人文学术和宗教学术研究提供资料。鉴于上述理由，我们也希望这项工作对于中西文明的交流有所贡献；还希望通过对西方文明精神认识的深化，对于中国文化的更新和中国社会的进步有所贡献；更希望本

着中国传统中谦虚好学、从善如流、生生不已的精神，通过对世界历史和人类文明中基督教精神动力的了解，对于当今道德滑坡严重、精神文化堪忧的现状有所补益。

尽管近年来翻译界出版界已有不少有识之士，在这方面艰辛努力，完成了一些极有意义的工作，泽及后人，令人钦佩。但是，对我们这样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千年古国和文化大国来说，已经完成的工作与这么巨大的历史性需要相比，真好比杯水车薪，还是远远不够的。例如，即使以最严格的“经典”标准缩小译介规模，这么一个文化大国，竟然连阿奎那（Thomas Aquinas）举世皆知的千年巨著《神学大全》和加尔文（John Calvin）影响历史的世界经典《基督教要义》，都尚未翻译出版，这无论如何是令人汗颜的。总之，在这方面，国人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本译丛的翻译出版，就是想以我们这微薄的努力，踏上这漫长的旅程，并与诸多同道一起，参与和推动中华文化更新的大业。

最后，我们应向读者交代一下这套译丛的几点设想。

第一，译丛的选书，兼顾学术性、文化性与可读性。即从神学、哲学、史学、伦理学、宗教学等多学科的学术角度出发，考虑有关经典在社会、历史和文化上的影响，顾及不同职业、不同专业、不同层次的读者需要，选择经典作家的经典作品。

第二，译丛的读者，包括全国从中央到地方的社会科学院和各级各类人文社科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高等学校哲学、宗教、人文、社科院系的学者师生，中央到地方各级统战部门的官员和研究人员，各级党校相关教员和有关课程学员，各级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官员和研究人员，以及各宗教的教职人员、一般信众和普通读者。

第三，译丛的内容，涵盖公元1世纪基督教产生至今所有的历史

时期。包含古代时期（1—6 世纪），中古时期（6—16 世纪）和现代时期（16—20 世纪）三大部分。三个时期的起讫年代与通常按政治事件划分历史时期的起讫年代略有出入，这是由于思想史自身的某些特征，特别是基督教思想史的发展特征所致。例如，政治史的古代时期与中古时期以西罗马帝国灭亡为界，中古时期与现代时期（或近代时期）以 17 世纪英国革命为界，但是，基督教教父思想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后仍持续了近百年，而英国革命的清教思想渊源则无疑应追溯到 16 世纪宗教改革。由此而有了本译丛三大部分的时期划分。这种时期划分，也可以从思想史和宗教史的角度，提醒我们注意宗教和思想因素对于世界进程和社会发展的作用。

中国人民大学宜园

2008 年 11 月

中译本导言

汤普森 (Glen Thompson)

一、阿塔那修和他的基督教思想

本卷著作及后续各卷将使中文世界第一次通过阅读亚历山大的阿塔那修的原著而了解他，这是非常重要的。在过去的一千五百年间，东方基督教（东正教）一直视“圣”阿塔那修为其理论的奠基者。尽管在西方基督教（天主教）中奥古斯丁的形象占据主导地位，但也同样对阿塔那修给予很大的尊敬和重视，声称他是“教会四博士”之一。新教神学家也高度重视阿塔那修，不仅公开承认他著名的三一神论，还把他看作认信基督徒（*confessing Christian*）的典范。“*Athanasius contra mundum*”——“阿塔那修对抗世界”——不仅成为描绘他一生大胆批驳阿里乌教义的简明写照，也表明他反对那些强迫他和他的良知接受在他看来与圣经相反的信念的皇帝和公会议的立场。

然而，对现代人来说，阿塔那修并非一个特别合宜的人物。他在许多人看来微不足道的神学观点上立场坚定，毫不妥协，这与现代以求同存异的方式使各个教会和不同宗教达成统一的努力不甚协调；在把“真理”看作个人的领会而不应“强迫”给别人的存在主义和后现代

思想家看来，也是无法理解的。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阿塔那修的事例、生平和作品可能对现代对话有一定贡献。他对一切试图把命题真理的重要性降到最低的肤浅做法提出了挑战；他的生活动荡不安，屡遭流放，恰恰表明那些反对这种强硬立场的人自己常常做出粗暴行径。

其实，基督教神学的历史为阿塔那修的信念作了见证，即对基督的神性和人性的正确理解是一以贯之的救恩论所绝对必需的。今天的基督教会仍然坚持认为，唯有那些教导“基督是完全的神”的人和组织才能被称为“基督徒”（由此把诸如耶和華见证会和摩尼教排除在外）。唯有那样，其他教义——创造论，基督的道成肉身，甚至复活——才是完全可理解的，富有意义的。因而，他死后一个世纪（或更长一点），西方教会对三一神论提出了更完备的信经解释，它成为许多人所知的“阿塔那修信经”。这一新信经不仅反映了阿塔那修提出的神学，还包括很大程度上由于阿塔那修的坚忍不拔而得以在教会盛行的神学理论。

阿塔那修还要求他自己所在的亚历山大教会回到以圣经为坚实基础的神学上。他的前辈，尤其是亚历山大的克莱门（Clement of Alexandria），愈加在柏拉图和新柏拉图的理论框架内阐述他们的圣经神学。然而，阿塔那修虽然也与当时的哲学对话，这一点可以从《驳异教徒》和《论道成肉身》中清楚看出，但更以一种比较公然的圣经方法“做”他的神学。他的大部分布道和解经作品都没有保存下来，但我们仍然可以从他的作品中看出，他解经的出发点正是圣经的经文，而不是哲学范畴。由于亚历山大是罗马世界的哲学研究的中心，阿塔那修的进路不能只看作是他个人偏爱的问题，更应看作是他有意识的基本信念。基于所有这些原因，我们完全可以说，在过去一千五百年间，“阿

塔那修对抗世界”这一点几乎没有什么改变，在今天也仍然一如既往。

19 世纪后期，在菲利普·沙夫（Philip Schaff）和亨利·瓦斯（Henry Wace）的领导下，一群学者先是在英国后来在美国出版了三十八卷的早期教会重要作品的英文版，其中一卷就是阿塔那修的。这一卷使中文读者第一次读到阿塔那修的许多作品^①。英译者还像美国版那样为每篇作品挑选了简短的导论。这有助于读者将这些作品放到它们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中去阅读。虽然正如在下面我要简单地指出的那样，上个世纪的学者在了解阿塔那修及其作品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虽然通常指的是阿奇巴尔德·罗宾逊（Archibald Robinson）的“阿塔那修的作品和书信精选”的各种译本和注释，但是“主教阿塔那修”这个英译本仍然是研究这位重要的思想家和早期教会领袖的最佳单行本。

二、4 世纪的基督教会和埃及

阿塔那修的童年时代是自使徒时代以来早期教会中最变化莫测的时代。3 世纪时，罗马帝国变得越发难以维系它对地中海世界的控制权。通货膨胀和其他经济灾难使所有阶层都感到越来越大的经济困苦。美索不达米亚的帕提亚（Parthia）军队施加军事压力，欧洲入侵者跨过多瑙河，这些事情使皇帝们把越来越多的时间花费在保卫边境上，而处理内部问题的时间却越来越少。他们的在位时间通常都非常短促，大多数都因军队领导的叛乱而终止统治。

① 爱丁堡版的“前尼西亚教父”作品，也就是公元 325 年尼西亚会议之前的作品，最初是八卷（美国版为十卷）。后来出版了两个系列的“尼西亚和后尼西亚基督教会教父选集”。第一系列包括奥古斯丁和克里索斯托（Chrysostom）的十四卷作品。第二系列由多位作者的另十四卷组成，包括第四卷阿塔那修的作品和书信选集。

这种风雨如磐的黯淡处境到了戴克里先 (Diocletian) 统治 (284—305) 时期得到了引人注目的改善。他试图通过固定价格以及对帝国的彻底重组来控制通货膨胀, 这是他最为人称道的一件事。从 285 年开始, 他作为地位最高的皇帝 (奥古斯都) 统治帝国的东部, 另一奥古斯都统治西部。十年之后他又添加了两位助理皇帝 (凯撒), 掌管他们的一半区域。由此, 这四位统治者分别统治大约四分之一领域 (辖区), 每个领域又分成更小的区域 (主教辖区)。这一制度意在简化管理, 同时为将来的皇帝提供一个训练场所, 以及比较明显的接任方式, 从而借助军队的力量控制对继承人的指定。戴克里先的措施虽然没有完全挽回罗马的衰落, 但它们确实在许多领域产生了非常直接的积极效果。

戴克里先和他的新联合统治者的另一首创举措是恢复百姓的精神面貌, 反对不断增加的基督教会。基督徒拒绝向皇帝的神灵 (守护神) 献祭, 也不参加国家传统的宗教仪式, 尽管这些仪式被认为对正在进行的对地方城邑和更宽广的帝国区域的神灵保护至关重要。此外, 地方上的基督徒会众有自己的治理结构 (牧师和主教), 向他们寻求许多方面的生活指导和帮助, 往往使当地的政府官员边缘化。戴克里先遵照早期一些皇帝的做法, 颁布了连续四个反对基督教会的法令。他下令关闭他们的建筑, 查抄并焚烧他们的书籍, 强迫他们的领袖放弃信仰, 要求全体基督徒献异教的祭, 否则就要处死。随后的十年间有成千上万的基督徒死去, 因为这一法令在某种程度上贯彻到帝国的每个角落。尽管有些基督徒确实放弃了自己的信仰, 但其他许多人反而对自己的信仰更加忠诚和敬佩, 心甘情愿赴死。

戴克里先和他的联合皇帝们于 305 年退位之后, 帝国就按他的新计划划分。然而不久, 皇帝和凯撒就开始彼此争战。到了 313 年, 君士

坦丁 (Constantine) 成了西方的独一统治者，而李锡尼 (Licinius) 全权统治东方。此前某个时刻，君士坦丁已经信靠基督徒的神，因而，他和李锡尼发布了一个联合声明 (所谓的米兰敕令)，首次使基督教会合法化。君士坦丁的政策远不止于此，不久还赐给教会及教职人士许多特殊的恩惠。后来他打败李锡尼，接管了整个帝国的统治权 (324 年)。基督教历史学家优西比乌 (Eusebius) 衷心赞颂君士坦丁，撰写了他的传记，把他描述为神教教会的特定代理人。这就是阿塔那修于公元 328 年当选为埃及的亚历山大主教时的境况。

三、阿塔那修的生平

阿塔那修成为主教时还十分年轻，因为后来他的一些仇敌说，他当主教时还未到所规定的三十岁年龄。学者们据此推定他出生在公元 295—300 年。他肯定受过完整的学校教育，并很早就表现出对教会的委身，因为他先是教会的读经者，然后 (约于 318 年) 成为亚历山大教会的执事。主教亚历山大不久让阿塔那修做了他的文书，阿塔那修就以这一身份伴随亚历山大参加了 325 年在尼西亚举行的伟大的基督教大公会议。三年后，亚历山大逝世，阿塔那修被选为他的继任者。

主教的工作就是负责其教区会众的教义和活动。亚历山大主教，除了直接监管埃及最大的城市之外，根据早期惯例，也是全体埃及教会以及昔兰尼 (现在的利比亚) 教会的最高权威。他负责牧者的训练和授任，其他主教的任命，解决基督徒之争的争论，主持洗礼，指导崇拜事宜。阿塔那修的这一方面工作可以从他现存的“节期信函”中看出，这是教会对每年最神圣的节期，庆祝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复活节的公告。作为亚历山大主教，他还要与其他主教和区教会领袖通信，主持

整个地区的教会领袖会议（公会议或教会会议），是全体教会的公开发言人，也是与政府对话的人。

阿塔那修除了正常工作之外，还面临着两个持不同意见的基督教团体——梅勒提乌主义（Meletians）和阿里乌主义的难题。戴克里先逼迫结束之后，许多原本为逃避审判和惩罚而背弃信仰的人开始忏悔，希望能重新回到教会。梅勒提乌主义者反对接纳他们。当亚历山大主教真的允许他们被重新接纳之后，吕克波利斯（Lycopolis）的梅勒提乌主教的追随者就分裂出去，组成独立的会众，有自己的神职人员和管理机构。尼西亚公会议（325年）试图修补这一分裂，但他固执己见，而阿塔那修花了大量时间试图把这些持不同意见者劝回到教会，也没有成功。

第二个团体由阿里乌领导，阿里乌是个天资聪颖的牧者，在亚历山大讲道。大约318年他开始传讲耶稣不是真正永恒的神子，因此他的神性也不与父等同。结果，他被埃及主教们罢黜。然而，他的教义仍然广泛传播，因而，这一问题也是尼西亚公会议的主要议题。这次公会议进一步认定阿里乌的错误教义和对他的罢黜，皇帝还把他与他的一小帮同伙一同流放。然而，小亚细亚和叙利亚仍然有不少主教继续教导类似观念，因而，各种变种的阿里乌主义在4世纪仍然困扰教会很长时间。

阿塔那修坚定而公然地反对任何形式的阿里乌主义。不久阿里乌的支持者就把愤怒集中在他身上。335年在耶路撒冷和推罗（黎巴嫩）举行的公会议上，阿塔那修被罢黜。东方的主教们得到皇帝君士坦丁的支持，结果，阿塔那修被流放。皇帝于337年驾崩之后，他的三个儿子分治帝国，阿塔那修蒙允返回。但是，阿里乌主义的主教们说服东部的皇帝康士坦丢二世接受了他们的意见，于是，阿塔那修第二次遭流放（339年）。尽管罗马的一次公会议免除了他的罪名，但直到346年

他才能返回亚历山大。这一次阿塔那修得以任职十年，直到东方主教们终于第三次把他驱逐出境。接着他差不多有十年时间藏身于埃及修士之中（356—362），直到康士坦丢二世的继任者允许他返回。在他最终享受平安环境之前，还遭受了另外两次短时间的流放。他除了坚持不懈地与阿里乌主义作战之外，还一直努力弥合梅勒提乌主义的分裂。他卒于 373 年。

四、阿塔那修的作品

阿塔那修的许多作品都反映了他动荡不安的生涯。我们上面提到他的年度牧函“节期信函”，有许多幸存下来。除了一些私人书信外，阿塔那修的大部分作品都出于与阿里乌主义者辩论之目的，而且大部分似乎写于他的流放时期。

他刚任主教的那个时期，或许更迟一点，在其第一次流放便完成了驳异教徒的两卷本，也就是包括在本卷里的前两篇作品——《驳异教徒》和《论道成肉身》^①。在第二次流放之初，他撰写了致全世界主教的《通谕》，接着写就了他驳阿里乌主义者的四篇演讲中的前三篇。后来在八年流放期间，他编纂了冗长的《反驳阿里乌主义者的辩护》（或第二辩护），穿插着对自己在论辩中行为的阐述和解释。350 年代早期，他写了《论尼西亚信经》和《在康士坦丢二世面前的辩护》，都是在亚历山大时写的。但是，到了 356 年，他遭受了第三次流放，这一次藏身于埃及修士之中。在这一时期，他写了《对自己逃离的辩护》（或第一辩护）、《阿里乌主义的历史》，以及《论教会会议》。也正是在这段藏身于

① 在古希腊罗马世界里，书是写在纸莎草纸或兽皮上的卷轴。由于卷轴体积庞大，所以其长度被限制在 6—7 米之内。这就限制了每一“卷”书的长度，也使得长一些的作品被分成好几“卷”。

修士中的时期，他写了早期最著名的修士的传记：《安东尼传》。此外，还有大量长短不一的书信和布道书，都得以保存下来。现在我们要对本卷中收集的作品作一简短介绍，以更新每篇作品前所附的前言内容。

五、本卷作品介绍

1. 《驳异教徒》和《论道成肉身》

这两篇作品成书于何时，学者们至今仍是众说纷纭。由于它们没有直接指明是针对阿里乌和他的教义（阿里乌及其教义约于公元 319 年开始扰乱埃及教会），传统上把这两篇作品的时间定在这一时期之前（见下面对此作品的介绍）。然而，如果阿塔那修出生于公元 300 年前不久，那么成书时他应该非常年轻。在许多学者看来，他实在太年轻了，不太可能写出如此成熟的神学和哲学著作。这使后来的学者把这两篇作品的时间往后推了几十年。比如查尔斯·肯南吉瑟（Charles Kannengiesser）注意到阿塔那修的这两篇作品与他第一次流放时期的《节期信函》（335—337）“在文字上非常相近”，因而认为其成书时间应在公元 330 年代。而巴恩斯（T. D. Barnes）提出，这两篇作品写于阿塔那修 325 年前往尼西亚的途中。

这两篇作品是早期基督教的文学类型“护教文”的典型。护教文是为应对非基督徒就正在发展的信仰的教义和习俗提出的哲学、道德和宗教上的异议而写的，在 2 世纪早期就已经开始应用。最早的教会历史学家凯撒利亚的优西比乌（《教会史》5.3）就引用过某位夸达拉图（Quadratus）写给哈德良皇帝（Hadrian，117—138 年在位）的一篇护教文。亚里斯蒂德（Aristides）、殉道者查士丁（Justin Martyr）、塔提安（Tatian）、德尔图良（Tertullian），以及其他许多人，包括凯撒利亚的